

## “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的發現及其價值

盧嘉諾\*

**摘要** 2018年12月香港海事博物館“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展覽曾展出一幅名為*Guangzhou School: A Bird's-eye View of Macao*的澳門港口畫作，該畫作在2022年6月被澳門歐氏家族於美國拍賣行投得。其描繪的是清同治年間澳門半島及周邊地區的景象，清晰地展現出澳門半島和周邊地區的地理、地形以及澳門多處重要建築，其中多個地標、地名以及圖像均為學術界首次發現，畫作較符合1866至1874年間的澳門整體城市風貌，反映出甲戌風災之前澳葡當局對澳門半島殖民擴張的影響。若該圖確為上述時間段所作，將成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初的澳門城市圖像補充史料，有助澳門城市史、澳門社會經濟史研究者對十九世紀中葉澳門城市肌理及脈絡進行更為深入的判斷、互證及分析，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極其重要的澳門畫作。

**關鍵詞** 澳門；同治；地圖；畫作

### 引言

2018年12月14日至2019年4月14日，香港海事博物館“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展覽曾經展出一幅長達1.7米的澳門港口畫作，畫作名為*Guangzhou School: A Bird's-eye View of Macao*。《南華早報》記者斯圖亞特·希佛（Stuart Heaver）在2018年12月17日論述中美問題的報導上曾提及該展覽，並附上了該地圖的相片；<sup>1</sup>其後，該畫作由香港收藏家售出，並由澳門歐氏於2022年6月在美國洛杉磯邦瀚斯（Bonhams）拍賣行投得。2022年11月12日，筆者留意到澳門城市史研究者林翊捷先生在文化講堂“鄉關何處：澳門早期聚落”講座中提及該畫，他推測該畫大致為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作；2023年6月16日至7月2日，畫作在澳門紐曼樞機藝文館“紀念葡荷澳門戰役四百零一週年歐氏家族收藏展”上展出。<sup>2</sup>

\* 盧嘉諾，澳門大學“濠江學者”（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澳門科技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澳門社會經濟史、人口史、地圖史及香山地區史等。

鑑於該畫基本反映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的澳門城市肌理及整體風貌，筆者建議稱其為“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下文以“同治畫”代稱），如該畫確係百餘年前所作的真跡，將豐富澳門地圖及港口畫在該時段的圖像史料，並能夠與同時代的西方地圖作相互對照。在獲得現收藏者授權的前提下，<sup>3</sup>本文將對該畫進行首度且系統的學術研究，試圖解讀圖像中的重要歷史信息及發掘其重要價值。

### 一、圖像呈現的香山縣及周邊海島地理信息

“同治畫”為傳統水粉設色，目前的品相整體良好。該畫經過重新裝裱，邊緣處有零星破損，圖像有零星霉點，“西夷大炮台”與“龍田村”的“田”之間有破損，中間部分有重新修復裝裱痕跡。

圖像左上角為地理位置的西北方，在“關閘舊址”（明清關閘城樓）處繪有關閘汛牆及數間房屋，屋間空地豎有象徵中方勢力的中式官方“黃旗旗杆”（底部一般為旗杆礎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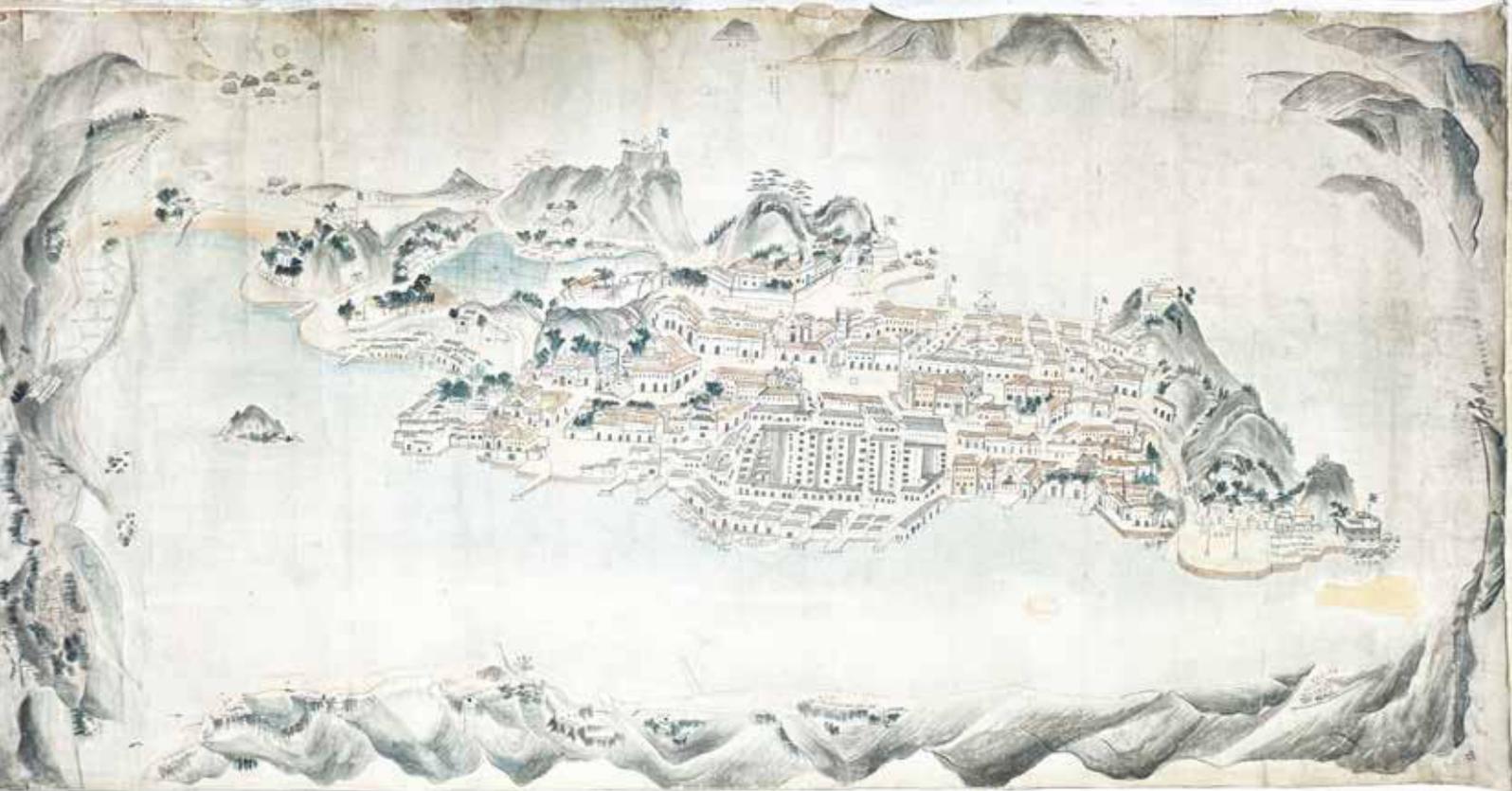


圖 1. “清同治年間澳門港口圖”（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城樓北部（圖像之左方）標有“高沙”並在沙堤旁繪有樹林、房屋；高沙北邊、蓮花莖的盡頭標有“三練團”並繪有樹林、房屋；往東向吉大村方向繪有樹林，並標有“吉大村由此進距澳十五里”，向讀者說明吉大村的方位；再往東即至珠江口海面，繪有九個島嶼並標有“九洲洋”，又在上方標註“由此洋進省”。此處細節暗示了作者與讀者“對話”的語境——“進省”即表往“省城”廣州之意，即意味着其採用中式傳統的習慣話語，故此圖應當於華人間流通，其目標群並非“夷人”。

“九洲洋”再往東（圖像之右上方）繪有山形圖案並標有“沙壆”字樣；“沙壆”山右側為海面，海面往南（沙壆之右方）為只繪有岸邊的“大葡萄”島，再右側為“小蒲萄”島；繼續往南是一座更大型的島嶼，其岸邊繪有灘塗地，上方標有“沙瀝”標識，並附有“來往夷船多在此處寄泊”字樣，此處應為常見於葡文文獻中的 Rada 或 Rada da Macau（澳門錨地）。

“沙瀝”位於“雞頸山”（即大氹仔島）的東北部，與圖中“氹仔”（即小氹仔島）所在的海島之間隔着“乾門”。氹仔處繪有中式民房及“菓欄山汛”，在“夷炮台”處標有“此炮台道

光二十七年新建”，右側標有“十字門”。與“十字門”隔海相望的應屬小橫琴島，島的兩側標有“瑪瑙洲”及“橫琴山”兩處地名。按照實際地理方位，小橫琴島對岸應為灣仔的馬騮洲，在圖中的對應位置可見標有“馬騮洲”，又附有“由此海直通香山新會”的標識，其對岸為“媽閣炮台”。

按照繪圖者的構圖，高沙向西（圖像的左側部分）則進入北山嶺一帶，若向西北方向“前行”將經過大片“圍田”，至“拉塔炮台舊址”，<sup>4</sup>該炮台為石製，繪有中式官方黃旗；炮台山腳下近岸處繪有七塊礁石，標有“七姐妹石”；炮台左側繪有位於林中的“北山嶺”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村口的“文閣塔”，雖然沒有文字標識，但亦被作為地標繪出；北山嶺村往西為“白石村”，繪有林中村落及更多的房屋，且村前有“田”；再往西為“廈村”“星橋”，過橋為“前山寨”，寨城位處山下，設有城牆，圖中繪有“南”“西”二門，城內外繪有房屋、黃旗及樹林，城外為“田”，田往河邊繪有“北山渡頭”，應為往來南屏（時稱“沙尾”）、北山二村的渡船所用；在“北山渡頭”與“七姐妹石”之間為“亞婆石”，位於現珠海“婆石”村，再往西為“牛塘坑”。

## 學術筆記



圖 2. 吉大至沙壩一帶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3. 沙瀝周邊海島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4. 砵仔炮台及“葉山訊”（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5. 馬騮洲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學術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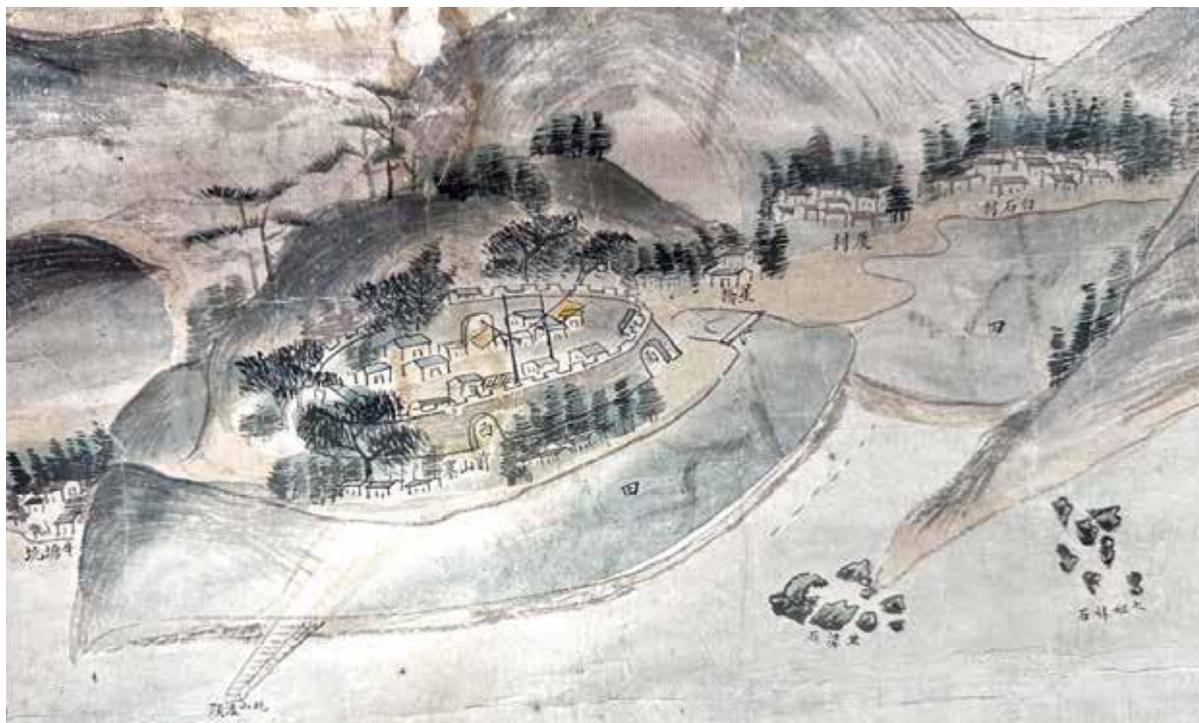


圖 6. 前山寨周邊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7. 沙尾村及北山村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北山渡頭”對岸（即圖像的下方）應為現南屏、灣仔一帶，該側所有房屋建築幾乎均建於高山山腳，且大多沿着河流岸邊分佈。從左至右來看，最左側標有“沙尾村由此進”，周邊繪有渡頭、房屋，標有“囊涌”；往南為“北山村”，林中繪有房屋、高塔；再往南為“九窰頭汛地”，<sup>5</sup>繪有小炮台及黃旗；汛地往南繪有“土地廟（廟）”，廟前有巨石及渡頭，標有“石角嘴”，廟後往南上山有標註“客家”的房屋群；再往南繪有“華光廟（廟）”，<sup>6</sup>山上又有“海門右廟（廟）”；再往南經過“沙”及另一處大渡口，即為“灣仔村”；繼續往南，在山間隱約繪有一行房屋，但無文字標註；盡頭繪有數間蓬寮，標有“銀坑蛋戶蓬寮”，意指銀坑附近的蛋民聚居點；最後在圖像的右下角標有“西”字，這也是全圖唯一一處方位標識——從現代較精確的地圖來看，南屏、灣仔一帶位處濠江水道西側，此處的“西”應該是作者希望藉此告知讀者大致的方向，是因應其繪畫方式而定，而非精確的地理方向。

作者採用了特殊的繪畫佈局，並未採用精準的“上北下南”或“左北右南”模式，這顯示出其核心在於“示意”，與現代西方精準繪製的航海圖、地形圖有所區別。其繪製方式與道光《香山縣志》中的〈濠鏡澳全圖〉〈澳門東環圖〉〈澳門西環圖〉均有相似之處，然而在細節上，包括房屋繪製以及地名等，又有眾多不同。<sup>7</sup>“同治畫”的重點在於描述澳門半島的細節，並藉此顯示其與周邊地區的大致方位關係，作者在繪製澳門半島周邊地區時，往往呈現出東南西北無法完全對應的情況，故採用“由此洋進省”“由此海直通香山新會”等標識，向讀者說明周邊各島的通航情況。這種看似“漫不經心”的不準確，既表達了精確的方向並非此圖所求，又暗示了更深層次的含義，即作者似乎認為讀者“有能力”辨別周邊地區方位，了解這些航路的基本知識。換言之，讀者與作者應存在一定的地理知識“對話基礎”。筆者由此推定，該畫作並非一般商品、工藝品（因為商品完全沒有必要清晰標註地理名詞尤其是漢文地名），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甚至政

治、軍事用途）的地理示意圖，其重點在於描述澳門及氹仔的政治及地理現狀。

## 二、圖像呈現的澳門半島地理信息

澳門半島的細節描述，乃“同治圖”最為重要的部分，且對於澳門城市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若將“同治圖”對比1865至1866年由法國人繪製的澳門地圖，可發現兩者所呈現的地理信息高度吻合：關閘以南一帶，靠近蓮花莖南段處有座依山而建的“新廟”，此處的“新”並非表該廟為近期所建，譚世寶曾提出“因為蓮峰廟與馬角的天妃廟具有同是官、商共建，同把媽祖與觀音共處一廟而分置於前後兩間殿閣的特點，又因其建於馬角廟之後，故又俗稱‘娘媽新廟’，略稱‘新廟’”，<sup>8</sup>已釐清“蓮峰廟”又稱“新廟”之來歷，且蓮峰廟“係合澳奉祀香火，又為各大憲按臨駐節公所”，<sup>9</sup>具有“官廟”的性質。

蓮峰廟上方繪有“蓮峯山炮台”，炮台上豎有葡萄牙“藍白旗”，象徵此處為葡人所建，並示意此處已歸入葡人勢力範圍（前述的1865至1866年澳門地圖尚未繪出，因該炮台為1866年建成）；炮台上方的淺灣分別標有“湯狗灣”及“馬蛟石”，即現“割狗環”及“馬交石”；山以南繪有澳門華人村落“望廈村”，村內東側繪有一間三進建築，應為“普濟禪院”；村西有“望廈汛舊址”，立有黃旗，表示此處曾為清兵駐紮之處，望廈汛西側繪有碼頭，雖未有文字標註，但應為“望廈汛口碼頭”；望廈汛向南則繪有樹林並標有“沙崗”，西側為“新橋村”，房屋設於橋樑兩側；沙崗向南為“蓮溪廟”，廟背靠小山丘，山上繪有巨石；廟向南則有“新開馬路”，路兩側有“田”，沿“新開馬路”行進，則直達“三吧門”入“澳門城”。

望廈村東亦有“馬路”，應為亞馬留時代所修；沿田而行則繪有“西夷花地”——畫中這座建築群的形態與1865至1866年澳門地圖所繪較為吻合，應為亞美打神父（Vitorino

## 學術筆記



圖 8. 1865 至 1866 年澳門地圖中關閘以南至城牆以北一帶（圖片來源：W. A. Read. *China, Costa de Leste. Macau com as ilhas e costas adjacentes Feit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GE C-9481, Public domain<catalogue.bnf.fr/ark:/12148/cb406445100>. 筆者後製提供）



圖 9. 關閘以南至城牆以北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10. 關閘至蓮峰廟一帶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圖 11. 青洲、新橋及沙梨頭一帶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 學術筆記



圖 12. 望廈村至水坑尾門一帶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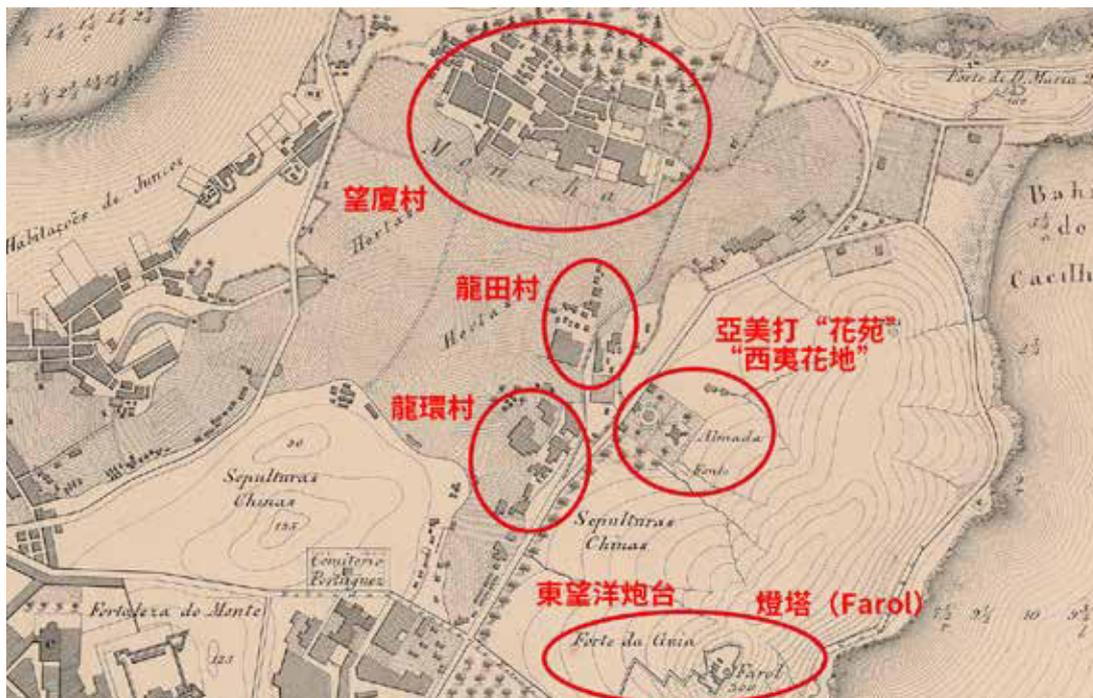


圖 13. 1865 至 1866 年澳門地圖中的望廈、龍田、龍環等村範圍 (圖片來源：W. A. Read. *China, Costa de Leste. Macau com as ilhas e costas adjacentes Feit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GE C-9481, Public domain<catalogue.bnf.fr/ark:/12148/cb406445100>. 筆者後製提供)

José de Sousa e Almeida) 所興建的園林式別墅。王文達曾記：

當時由亞美打神甫 (Fr. Almeida)，用廉價承購龍泉附近一帶坑谷田畝，經過一番填築修建，遂成為一所園林式之別墅，栽花植樹，稱之為花苑 (Flora) 焉。<sup>10</sup>

1865 至 1866 年的澳門地圖則在此處標註有“Almada Fonte”，表示該地“屬於亞美打”。文德泉在《澳門地名》(Toponímia de Macau) 中的“Jardim da Flora”一節稱：

以這個名字命名的花園位於東望洋山下的西北方向，延伸到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Avenida de Sidónio Pais) 上建築物的後面，在山洞巷 (Travessa do Túnel) 的兩側。花園所處的土地為亞美打 (Vitorino José de Sousa e Almeida) 神父所有……1848 年，神父在 Flora 建造了一座優雅的宮殿，是澳門建築師 José Tomás de Aquino 的作品。<sup>11</sup> 1872 至 1873 年，在蘇沙 (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 執政期間，這座宮殿被賣給了政府，這樣總督們就可以在那裡避暑了。<sup>12</sup>

文德泉又引述 1857 年 10 月 21 日《香港公報》(The Friend of China & Hong Kong Gazette)<sup>13</sup> 對該花園的描述：

……這塊地產在澳門很有名，它的主人投資超過 1 萬元 (\$10,000)。它的面積為 140,325 英呎，(整體) 呈正方形，分為兩個四邊形，一個用於種植觀賞性植物，另一個大約 6 英呎多，用於種植蔬菜和果樹。它收集了豐富的幾乎所有種類和國家的美麗和罕見的花卉，且用建築和欄杆進行裝飾，在下層平行四邊形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帶圓頂的小建築，由 16 根柱子支撐，裡面有一個噴泉，其水來自兩條溪流，上游和連續的 (superiores e

contínuas)，其中一條專門屬於花園。在上面的四邊形中，有一座宏偉的建築，被花園所包圍，周圍有欄杆和柱廊；這座建築包含 8 個房間和 2 個起居室，在夏季，它非常舒適，從那裡可以看到內港和鄰近的大部分地區的壯麗景色。這處房產的唯一抵押品是每年向政府支付的 8 元的小額租金；這處房產不能轉讓給中國人……<sup>14</sup>

結合《香港公報》中的描述，“同治畫”中的“西夷花地”基本符合當時亞美打神父的“花苑”建築的基本佈局，且其正前方繪有“龍田村”和“龍環村”，符合當時地圖呈現的地理佈局。

沿着“馬路”向南前行，路過一些房屋（應當為望德堂坊一帶建築）則至“水坑門”，沿山而上繪有城牆，即為澳門城牆；城牆自東向西途徑“西夷大炮台”（即大炮台）至與“新開馬路”相連的“三吧門”；繼續向西則為“沙梨頭”聚落群，止於“沙梨頭閘門”，其中繪有小山、樹林及“橙頂建築”，未標記處應為“賈梅士花園”（現白鴿巢公園）及“俾利喇別墅”（現東方基金會會址）；山下繪有“土地廟（廟）”，當為今沙梨頭土地廟，周邊建築多為“灰頂建築”，意指此處房屋多為中式建築，即華人社區；在“沙梨頭閘門”至“三吧門”之間標有“沙欄仔”字樣；沿“三吧門”向南繪有“花王廟（廟）”（現聖安多尼堂）及“大三把”（現聖保祿教堂遺址），<sup>15</sup> 此處的“大三把”已呈現大火焚毀後的教堂前壁遺址狀態，周邊建築多為“橙頂”——作者在表示，向南進入三吧門後即為“澳門城”，故大多數建築為“橙頂”，即“西式建築”。沿“三吧街”向東則與“水坑尾直街”的分支“近西街”匯流（1865 至 1866 年地圖分別用“R. de S. Paulo”“Rua do Campo”和“R. Formosa”表示）。“近西街”（Rua Formosa）一名在文獻中見於《1874 年澳門街道名冊》<sup>16</sup> 及《1905 年澳門街道名冊》（“近西街，Kan Sai Kae”）<sup>17</sup>，《1925 年澳門街道名冊》亦有記載（“近西街，Can Sai Cai”）。<sup>18</sup>

## 學術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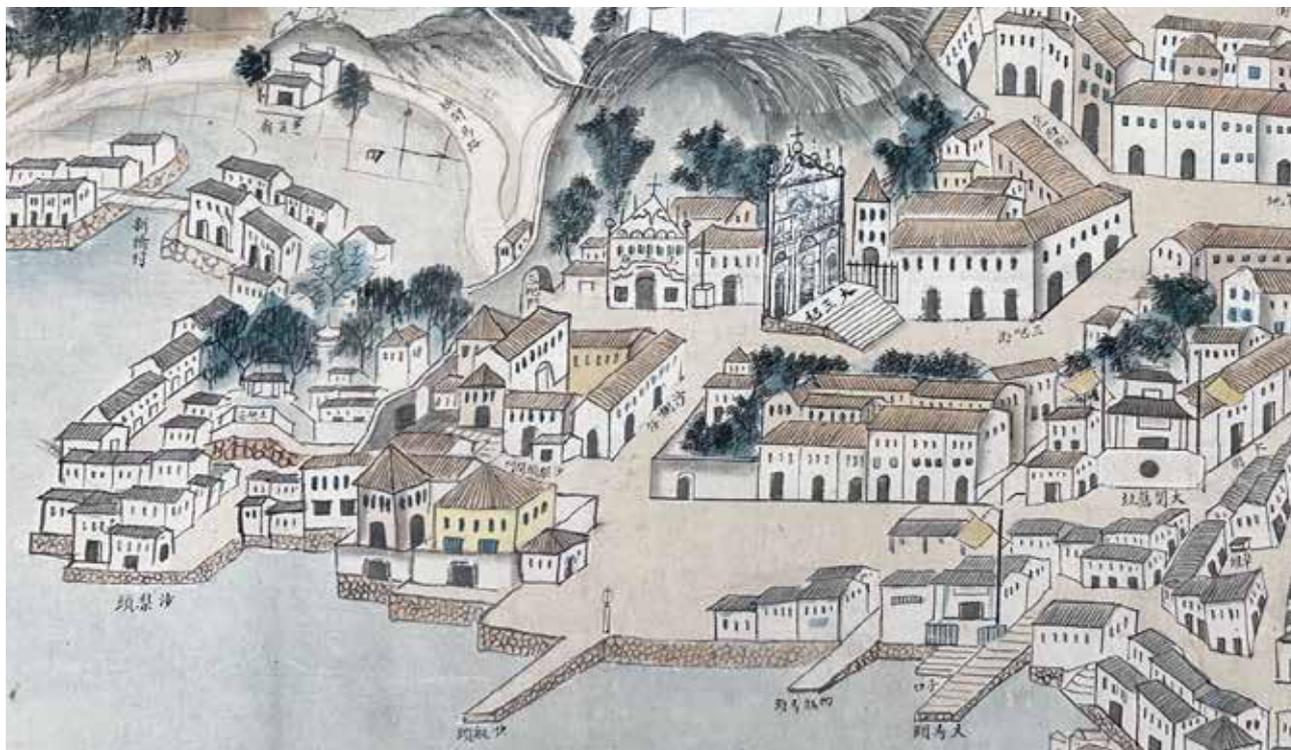


圖 14. 沙梨頭至三吧街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沿“水坑尾直街”南行，東側繪有依山而建的建築群，包括：“妮姑廟”“咖唸廟”“咖唸嘍前地”及“咖唸嘍炮台”；炮台之下沿岸繪有礁石及岸堤，再往南即為“南灣炮台”，旁邊繪有“兵頭住所”；繼續沿南灣南行至“燒灰爐炮台”，標有“燒灰爐街”，山上繪有“西望洋”教堂及建築群；沿“燒灰爐街”向西南行，可至“人頭井”，此處甚至繪有如今“亞婆井”的井口圖像，<sup>19</sup> 旁邊的山上繪有零星小房；繼續往南經過長樓梯向山下行進，則至“媽閣廟”，廟後山上繪有“海鏡”石。圖中清晰可見媽閣廟的大殿、弘仁殿、觀音閣等建築，廟右側還繪有“子口舊址”和一些灰頂房屋，以及葡人所建之“媽閣炮台”作為澳門半島最南端建築。

從“水坑門”沿“近西街”向南行，“近西街”與“三吧街”匯流之處為“賣草地”，周邊均為橙頂建築；沿“賣草地”南行進入澳門城的中心地帶，繪有“大廟（廟）”（即主

教座堂）、“板帳廟”（即玫瑰堂，或俗稱“板樟堂”）、“野仔廟”（即仁慈堂）、“議事亭”（即今市政署大樓）。議事亭廣場中心繪有“井”，“議事亭”左後方為“西夷死牢”，右後方為“龍嵩”教堂，教堂旁有“龍崧廟（廟）街”；經“紅窓（窗）門”南行，有“小三吧廟（廟）”（即聖若瑟修院教堂）、“三層樓”與“風信廟（廟）”（即聖老楞佐堂，或俗稱“風順堂”），“風信廟（廟）”以東有“呂宋館”並立有旗幟；向西往內港方向繪有大量沿岸建築，包括：“咁嗎行”“呵咁”<sup>20</sup>“下環街馬頭”，以及立有旗幟的“花旗館”。

在圖像的正中心位置，繪畫的是“市集區”（Bazar）。這個街區從議事亭前地向南一直延伸到內港沿岸，街區上方（東側）繪有“米糙街”及“墟亭”（即營地市集），北側繪有“大關舊址”（即原“關部行台”，1849 年被亞馬留下令拆毀），並標記有“大街”“小新街”“草



圖 15. 加思欄至南灣炮台一帶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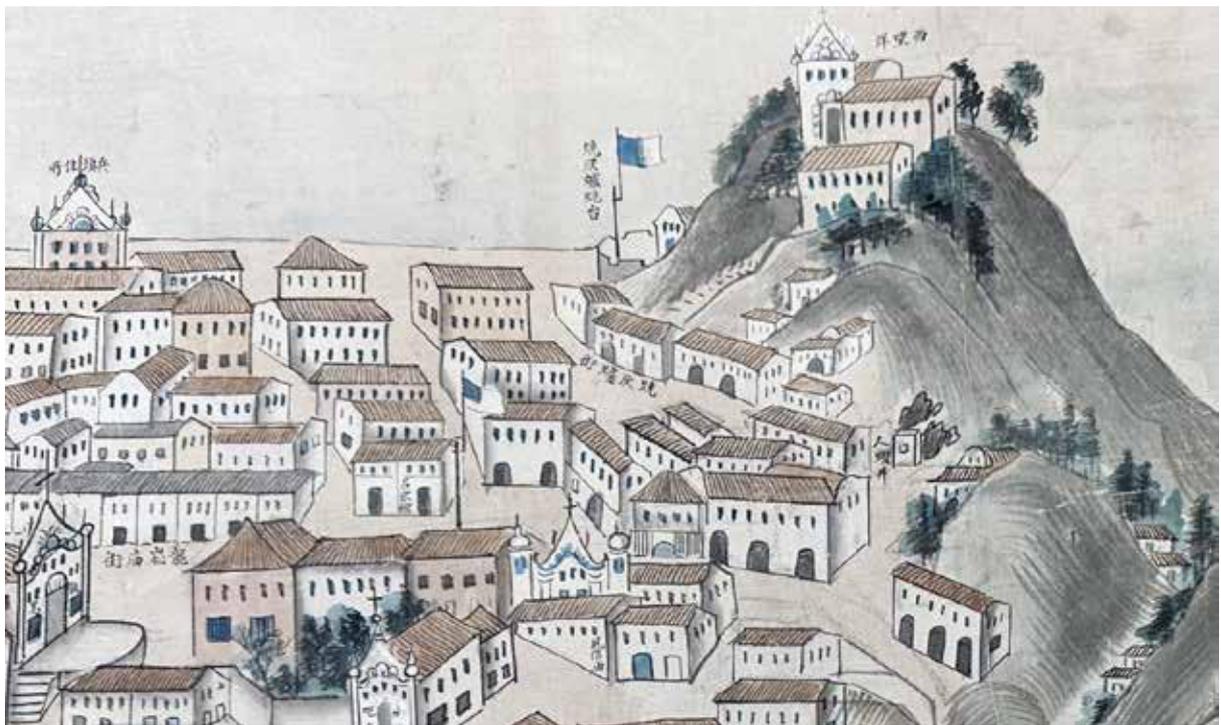


圖 16. 西望洋至人頭井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 學術筆記



圖 17. 媽閣廟至媽閣炮台（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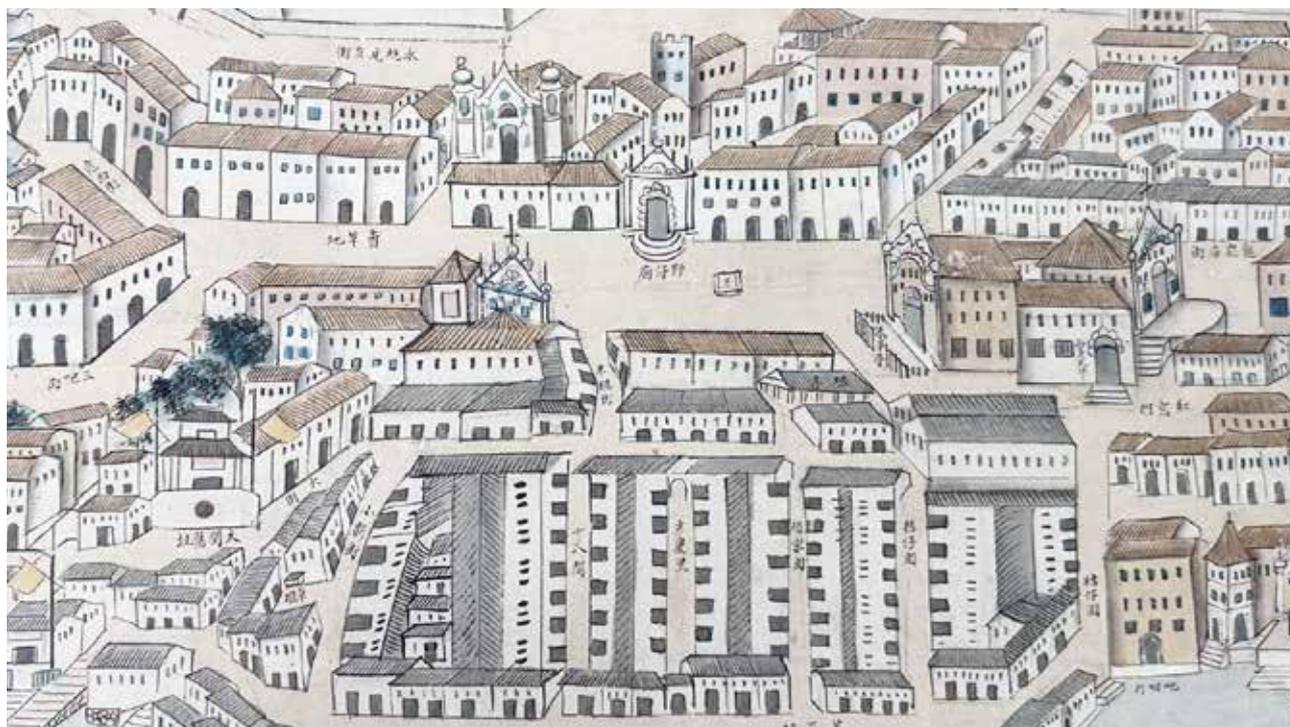


圖 18. 議事亭前地至市集區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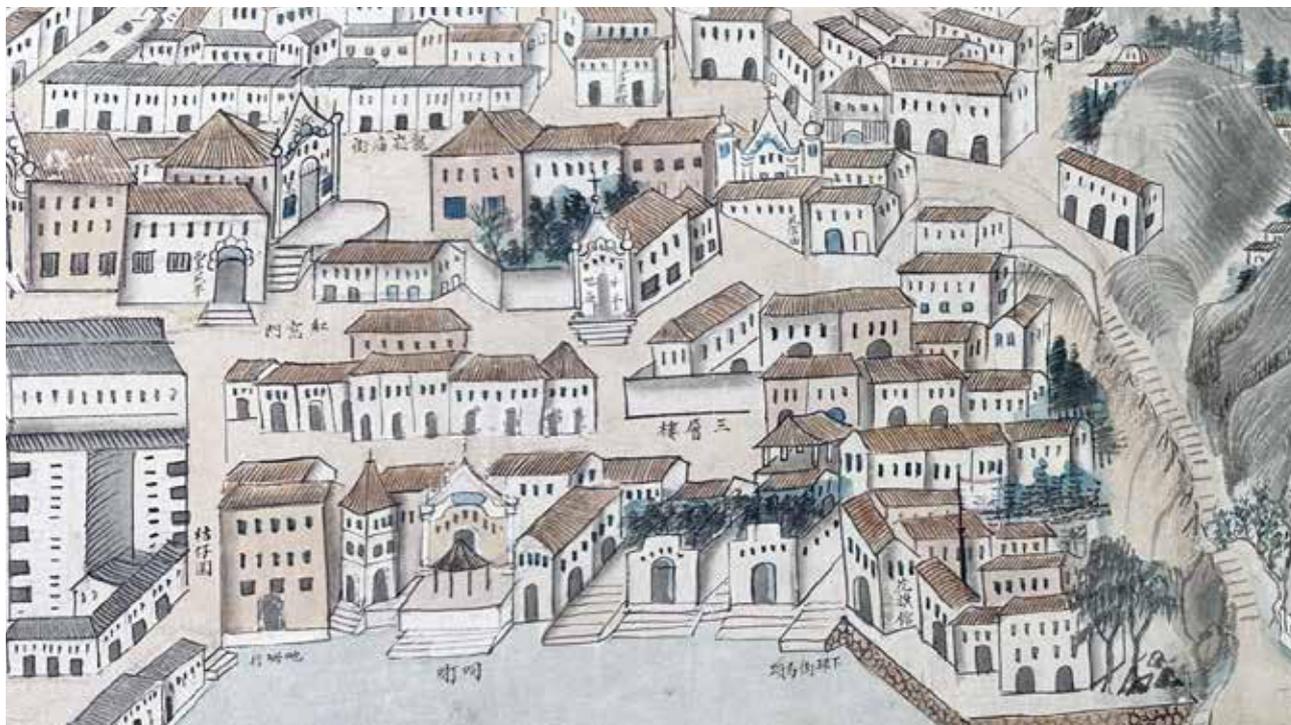


圖 19. 風順堂至內港一帶（圖片來源：筆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9 日）

堆”等地名。這裡的核心街區為扁平化的圍、里，這個區域的周邊一般又俗稱為“十八間”，包含了“十八間”“吉慶里”“趙家圍”“桔仔圍”“蘆石塘”等沿用至今的街道名；在內港一側，從左至右繪有多個渡口碼頭，如“四艚碼頭”“大馬頭”“船澳口”“新埗頭”“植槐里渡頭”“柴船尾”等，與道光《香山縣志》所繪的“步頭”及“水口”基本一一對應。在“新埗頭”與“船澳口”之間，還有一所標有“左署”字樣的灰頂建築，應為道光《香山縣志》卷四〈濠鏡澳全圖〉所標記的“左堂署”，即駐澳香山佐堂在草堆街附近的住所。駐澳香山佐堂因 1849 年亞馬留遇刺而逃回前山，<sup>21</sup> 自此佐堂署應已形同虛設。

### 三、“同治畫”的意義與價值

“同治畫”的重要價值在於呈現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澳葡殖民擴張為澳門帶來的一系列城市變化。我們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在澳門拍攝的相片可知，<sup>22</sup> 此時的澳門城區房屋極為密集，這也說明繪圖者在繪製的過程中有所取舍。如果這幅地圖的繪製年代當真為清同治年間，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中多處內容較為罕見，甚至應屬史學界首次發現：

（一）全圖以漢文作為註釋，是該畫作最為珍貴之處，這在現存的十九世紀中葉澳門地圖類畫作中較為罕見。該畫或許是學術界迄今為止發現的現存最早精確到街道單位並以漢文進行標示的傳世設色澳門港口畫。<sup>23</sup>

（二）該圖或許為現存最早載有東望洋燈塔（松山燈塔）、蓮峰山炮台（望廈炮台）、加思欄草地（加思欄花園）、西夷花地、氹仔炮台等澳葡地標建築圖像及圖註的中式畫作及地圖。

（三）該圖或許為現存最早一批清晰繪製

## 學術筆記



圖 20. 約翰·湯姆遜所攝之澳門半島相片（圖片來源：John Thomson. *Macao, China*. Wellcome Collection, 18839i, Public domain <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jbrm9axt>。）

並標記“新橋村”“龍田村”“龍環村”等華人聚落場景和“人頭井”“菓欄山汛”等漢文地名的中式畫作之一。<sup>24</sup>

（四）該圖用中文分別標註出“沙瀝”及“沙壩”兩處，為目前學界首見。

（五）該圖標記出大量諸如“大關”（關部行台）、“拉塔炮台”（北山嶺拉塔石炮台）、“子口”（媽閣稅口）、“望廈汛”等的“舊

址”，凸顯了澳葡的殖民擴張與香山縣對澳門管治的旁落。

（六）該圖標記了多條澳葡因殖民擴張、城市發展修建的“馬路”及“新開馬路”。

（七）該圖載有多個圍、里地名，深刻地說明圍、里是澳門中式傳統城市肌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華人扎根澳門、形塑澳門中華文化的體現，而非由葡人命名而得。

從圖像來看，“同治畫”向讀者呈現出一個十九世紀中葉因澳葡殖民擴張和人口增加導致“澳門城”外華人村落日益繁盛的澳門“城市想象”。十九世紀上半葉，華人人口是澳門總人口的大多數，奠定了以華人為主導的社會形態。龍思泰在《早期澳門史》指出，1830年澳門的葡人人口為4,628人，而華人人口為葡人的六倍。<sup>25</sup> 1836年，澳門居民近三萬，其中葡萄牙子民僅四五千，其他大部分為華人；<sup>26</sup> 據澳門議事會調查，1837年澳門華人人口達兩萬人，而葡人人口僅四千餘人；1839年林則徐視察澳門，檄令各級官吏查明澳門其時有“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戶，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英吉利國僑居夷人五十七戶，澳門華人則七千餘人（未計水上人口）”；<sup>27</sup> 1847年澳門居民總數為68,086人，葡人僅佔4,476人；<sup>28</sup> 1867年3月澳葡當局的報告指出：“澳門的華人人口多年來緩慢地增長，但自1864年年底起開始了快速增長，據較謹慎估算，已經增長一倍有餘。”人口增長導致澳葡大量填海造地並利用包括墓地等的荒地。<sup>29</sup> 由此可見，華人的大量遷入已經對澳葡當局造成一定壓力，而人口增加必定牽涉到生活用地及城市規劃等現代城市管理問題。

十九世紀下半葉，由於澳葡逐步推行殖民擴張，將澳門半島各村乃至氹仔、路環等離島納入管轄範圍，同時自1867年起相繼在上述地區進行人口普查，<sup>30</sup> 將原“澳門城”、澳門半島華人各村以及離島各村納入人口普查的範圍（普查的地理範圍和區域與“同治畫”所繪的澳門區域基本一致），在此過程中不斷推進華人各村的近代城市化，使得居住在“天朝鄉村”的華民逐步從“保甲之民”或主動或被動地轉變為“城市居民”。<sup>31</sup> 根據1892年香山知縣楊文駿的記載，澳葡當局已“將青洲至銀坑一帶全行佔去”，同治二年佔塔石、新橋、沙崗、石牆街和沙梨頭五村“添設馬路、門牌”；光緒五年佔龍田村並“將村左、村後兩處改造馬路，光緒九年，編入西洋戶籍，設立門牌”，光緒九年佔去望廈村，並“添設綠衣館、馬路、門牌”；咸豐年間佔去氹仔，並“設立門牌，建造綠衣館一

間，兵房一間”。<sup>32</sup> 可見，澳門半島華人村落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基本全數被澳葡實際佔領——澳葡已經在客觀上實現對澳門半島的全面掌控，並迫使各村傳統居民逐步向城市居民過渡。

“同治畫”所描繪的澳門城市狀況基本與澳葡當局在1867至1868年進行的“華人人口普查”報告相吻合。人口普查是政權體現其對該地區“擁有主權”的象徵，澳葡當局在未獲得清政府承認下於1867年首次對澳門半島華人人口進行非法的普查。在1867年的陸上華人人口普查報告中，直接以“基督教城”（Cidade Christa，即“澳門城”）、市集區（Bazar）、沙梨頭（Patane）、望廈村（Mong-ha）、聖拉匝祿區（S. Lazaro）、西望洋山和洗衣塘（Penha e Tanque Mainato）以及媽閣村（Barra）對澳門半島的陸地進行區域劃分，共普查了526條街道及8,819戶（Fogos）華人。<sup>33</sup> 從此次人口普查的範圍來看，澳葡毫無疑問是以普查的形式宣示其對望廈、市集區、沙梨頭以及媽閣村一帶的傳統華人村落的“實際管治”。自亞馬留推行殖民擴張舉措之後，澳葡當局持續在澳門城內收取公鈔、業鈔，並逐步將澳門城牆以北的華人村落視為其管治區域——“同治畫”中澳門半島北部的“蓮峯山炮台”，以及“關閘”和“拉塔炮台”被標註為“舊址”等信息，已向讀者說明，此時關閘以南一帶的管治權已經盡數落入葡人囊中。

另一方面，為何市集區會被“同治畫”置於中心位置？顯然，其意義是凸顯出該區重要的商貿地位。1867年澳門華人人口普查報告顯示，澳門半島華民有71,482人，其中陸上華民56,252人，水上華民15,590人，<sup>34</sup> 相較之下華人人口已為葡人的16倍之多。市集區人口也越來越多，但基督教城面積較廣，街道狀況也不相同，城內居民幾乎都是華人，有很多專門供華人租住的小街道。在基督教城180條公共街道中，僅16條沒有華人居住，<sup>35</sup> 可見此時華人已經佔據基督教城絕大多數住房。這也深刻地反映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華人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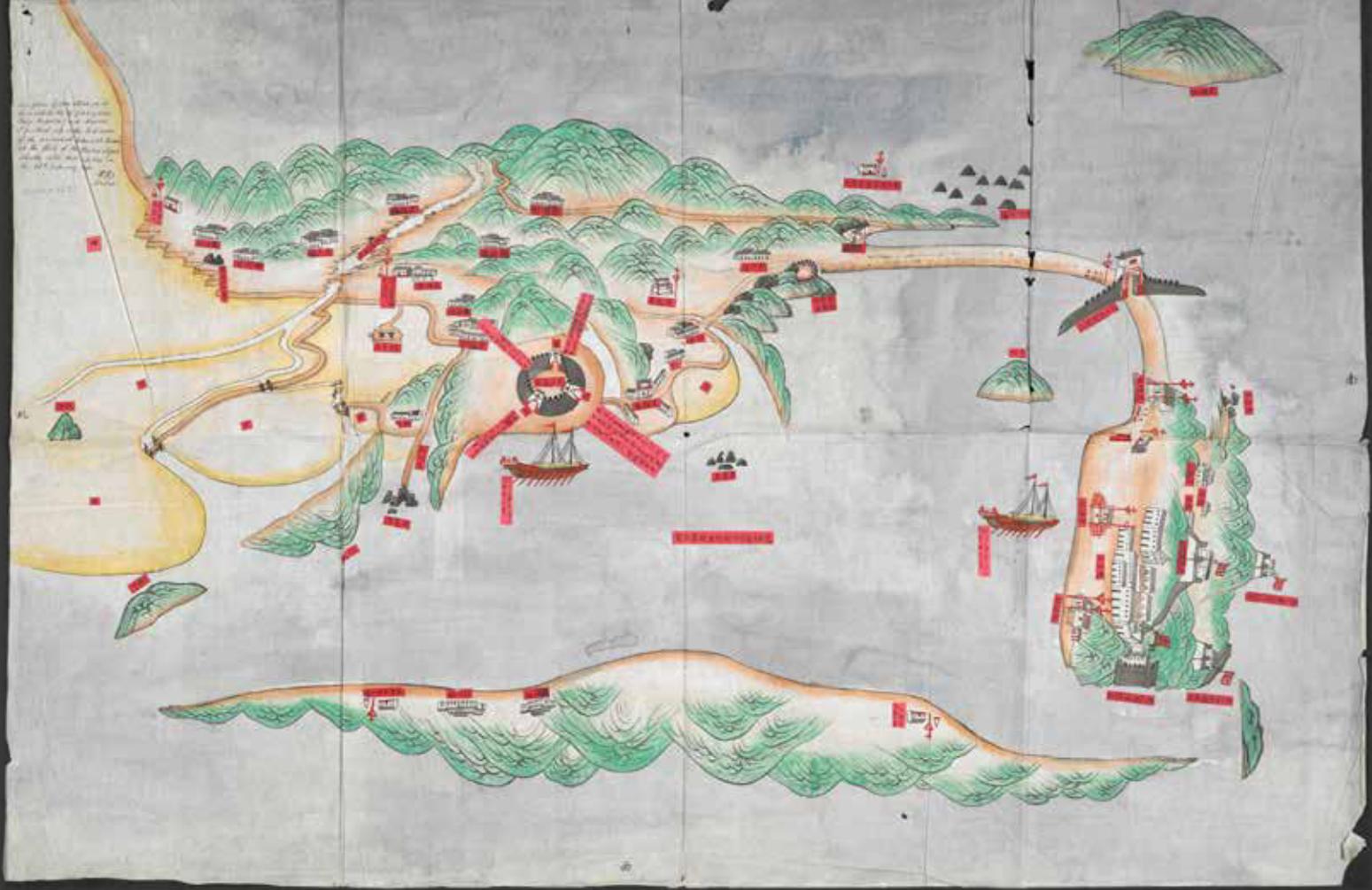


圖 21. 〈前山寨與澳門形勢圖〉 (General Map of Qianshan Fort and Macao) (圖片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Or. 12242 (7). 筆者複製提供。)

經佔澳門人口的絕大多數，而市集區作為基督教城外最大的華人聚集區（1867 年普查顯示市集區有 14,573 名華人，佔總人口 25.91%，僅次於有 20,177 名華人、佔比為 35.87% 的“基督教城”），<sup>36</sup> 同時亦是十八世紀以來澳門內港最重要的商貿區域，其碼頭具有重要的對外貿易作用，這也是作者希望強調的。

從畫面的佈局上來看，“同治畫”與另外兩幅創作於十九世紀且具有軍事目的的漢文畫作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一是現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澳門形勢圖〉。該圖是在嘉慶十三年（1808 年）英軍攻下澳門後製作的圖像，被附在嘉慶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兩廣總督吳熊光的奏摺之後。<sup>37</sup> 嘉慶十三年〈澳門形勢圖〉的軍事意味甚濃，重點在於關注前山寨與澳門周邊的軍事及地理信息，包括現灣仔、橫琴以及周邊海島；其佈局與“同治畫”基本一致，採用了“左北右南”的佈局，以蓮花莖為

中心將關閘以北的區域繪在地圖的左側，將澳門半島放置在右側，並將氹仔、橫琴等海島放在澳門半島的上方——這種做法會讓讀者誤以為氹仔和橫琴在澳門半島的東側，可見這些島嶼的準確地理方位並不是該圖的重點。其二是繪製於嘉慶十六年後、現收藏於大英圖書館的〈前山寨與澳門形勢圖〉。<sup>38</sup> 該圖以前山寨為中心，在圖像右側繪出澳門半島部分重要的軍事、政治及宗教建築，並同樣繪有灣仔一帶。然而不同的是，該圖是用紅紙貼在圖像上，再用漢文加以標註，且該圖的重點在於強調關閘以北一側的防務，應與其繪圖目的（防守關閘以北的前山寨及香山縣周邊地區）有關。

在對比上述兩圖之後，我們不難發現從“同治畫”圖像呈現的信息來看，作者顯然是一位熟悉澳門及周邊地區地理情況的中方繪圖師，且繪圖的原因也可能是以軍事、政治目的為導向，展現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在澳葡殖民擴張

的背景下，澳門因政治變動所經歷的城市變化之結果——1849年澳門半島的清廷駐澳官員被驅逐後，澳門半島城牆以北、關閘以南一帶悉數被澳葡佔領，昔日鉗制葡人的關閘城樓、拉塔石炮台、望廈汛地，連同象徵清廷主權的“大關”（關部行台）已成“舊址”。其相關的背景是：關閘城樓、界牆及周邊炮台早於1840年8月“中英關閘之戰”被佔領並損毀；<sup>39</sup> 關部行台於1849年被亞馬留下令拆毀；關閘與拉塔石炮台又於1849年8月“中葡北山嶺之戰”一度被葡軍佔領並損毀。<sup>40</sup> 一方面，該圖反映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新變化：葡人已佔領望廈一帶，並在蓮峰山上修建了新的炮台（1864年興建，1866年建成）以控制關閘至澳門城牆之間的土地，這也意味着關閘以南一帶的土地已盡收於葡人手中，香山縣失去了對這個區域的控制權，再結合東望洋炮台上的“燈塔”圖像，意味着這幅畫作應不早於1866年；另一方面，圖像還透露出此時的氹仔似乎並未完全被佔領：圖中氹仔處象徵中方軍事勢力範圍的“菓欄山汛”並未以“舊址”標誌，與葡人“道光二十七年新建”於“十字門”的“夷炮台”形成互相牽制之勢。<sup>41</sup> 按照此邏輯推理，原則上該圖的繪製年代應不晚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

在建築描繪的細節中，作者用“中式黃旗旗杆”表明“中方勢力範圍”（稅口、軍事據點），用“葡萄牙藍白旗”表示表明“葡方勢力範圍”；在各個重要的地標建築上以中文標註地名，並在個別處輔以補充說明文字；在部分外國領事府邸中，除了標明“呂宋館”“花旗館”之外，還在一側繪有代表其國籍的“國旗”，示意該建築的所屬與用途。在絕大多數的房屋刻畫上，作者用橙色屋頂表示“西式建築”，用灰色屋頂表示“中式建築”，以此區分中西建築用途；在教堂的刻畫上，則一律採用“西式正立面”的描繪方法，輔以灰白色的正立面塗色，突出建築物的西洋風格；而在“媽閣廟”、“新廟”（即蓮峰廟）、“蓮溪廟”等重要的中式建築上，則突出其中式建築構件特徵。

值得一提的是，此圖標識的“沙瀝”及其一側的“來往夷船多在此處寄泊”，在中文地圖類畫作中較為罕見，證實了金國平教授在〈西方近代水文資料譯文對澳門方志的影響〉一文中關於“沙瀝”的判斷——過往外文澳門地圖中常見有“Rada”或“Porto da Rada”的標示，金國平教授曾援引1861年由金約翰（John W. King）所著的《海道圖說》（*The China Pilot*），以及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國通商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並結合光緒《香山縣志》，認為沙瀝應為外文文獻中的“Macao Road”（葡語Rada與英語Road均有“錨地”之意）。衛三畏在1856年出版的《中國通商指南》<sup>42</sup>中曾提及“Macao Roads, called Sha-lek 沙瀝 are wholly open and undefended”（澳門錨地，沙瀝為完全開放且不設防），但上述推論似乎未能完全證實“Rada”或者“Macao Road”對應的位置及中文地名即為“沙瀝”，而《香山縣志》只有對“沙瀝”的地理位置描述，並未有具體的圖像顯示其地理方位。換言之，“同治畫”所描繪的情形，說明“沙瀝”一帶具有錨地的用途，應可佐證金國平教授的觀點，與現存的史料相互印證。

從作者想呈現給觀者的內容不難推斷，作者（至少是其中的參與創作者）掌握了大量且細緻的關於澳門半島及周邊地區的地理信息，尤其是澳門本地的古老地名，基本可以排除作者是商旅或赴澳旅居的藝術家——因為在用於商業銷售的地圖畫作中標記這類信息既無意義，也不現實，且圖中如“咖噠廟”“小三吧廟（廟）”等處都有用白色顏料覆蓋塗改、重寫的痕跡，說明作者曾經對該圖的地理信息進行修正，這也意味着地名的正確性是該圖作者所關注的重點，同時也說明其最初下筆之時並未百分百將所有的地理信息與圖中建築對上號。此外，圖中澳門半島房屋所採用的西式透視畫法，與澳門半島周邊香山縣屬地房屋所採用的中式畫法明顯有所區別，也就是說，參與繪圖者可能不止一人。更重要的是，繪圖者不

## 學術筆記

僅關注並呈現出澳門當時重要的城市地標，更花了不少筆墨在華人聚居點的重要建築和大量政治、軍事建築的刻畫上，又在特定的位置刻意用“舊址”強調此處發生的變化。以上均說明繪圖者可能被委派查明澳門形勢尤其是澳門的軍事、政治問題，其服務對象或目標讀者應為地方官員尤其是需要參與澳門問題決策的人士，甚至是省級官員，圖像中的地理信息對上述人物判斷澳門現狀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作者（們）熟悉澳門本地情況，甚至可能見證過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發生在澳門的地理及建築變化，故該圖如非仿古造偽，那麼大體上作圖時間應不晚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

從該圖所反映的澳門及周邊地理信息而言，它將學術界尤其是現當代研究者不少懸而未決的地名考據“迷霧”一下子撥開，圖中還出現了不少既有文獻中鮮有甚至從未出現過的地名。這也意味着，這幅圖“造假”的難度相當大：要想造假，那麼參與“造假”的製造者顯然是一名極為專業的澳門史研究者，具備極高的澳門及香山城市史的專業知識，對澳門十九世紀中葉的土名、地名以及當時的社會細節相當熟悉（甚至連當時所用的葡屬藍白旗都繪上），並將一些目前學者“尚存在疑惑”“仍在商榷中”的一些懸而未決的地名用自己的詮釋演繹在畫布之上。這樣做的風險非常大，倘若這張地圖實為“贗品”卻被認定為真跡，那麼將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學界對於十九世紀中葉澳門城市肌理的探索；倘若這幅地圖確係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所作，那麼將對澳門城市史，尤其學界關於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澳門城市肌理及當下現狀的判斷產生深刻的影響。它不僅能夠幫助我們窺探十九世紀中期華人對澳門城市空間發展的感知，還為我們呈現出在澳葡殖民擴張的背景下，澳門及周邊地區的城市、政治、軍事變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

### 結語

顯然，隱藏在地圖背後的歷史，向我們訴說着人類千年來的共同願望——繪圖者希望將現

實的三維世界濃縮到二維空間的平面中。然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往往無法將所有的細節內容於圖像上一一呈現；同時也由於主觀意識的“選擇”與某種程度上的“干擾”，使得地圖只能成為人類理解現實世界的一項工具，而無法真正“完美重現”。地圖並非單純解答諸如“我們如何從一個地方前往另一個地方”一類的問題，它還隱藏了人類通過對空間信息的處理，理解自身與現實物質世界之間的關聯。

“同治畫”所反映的時代背景，無疑是建立在澳葡殖民擴張之後的基礎上。1864年5月，澳門總督阿穆恩（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赴天津換約，中葡雙方就清廷在澳“仍設立官員”的問題產生重大分歧，葡方堅稱清廷派駐官員僅為負責貿易的“領事”，而非行使管轄權的官員。<sup>43</sup>因涉主權問題而被中方拒絕的阿穆恩無功而返，澳葡遂放棄以締約方式從清政府方面獲取澳門主權的路徑，<sup>44</sup>並開始在澳門成立管治華人的機構。1865年7月5日，葡萄牙政府頒佈針對華政衙門的敕令，<sup>45</sup>象徵着澳葡管理華人的專門機構——華政衙門及澳葡管治華人的格局基本形成。<sup>46</sup>1866年10月26日，柯打（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又譯“柯邦迪”）就任澳門總督，深知談判無效的他另闢蹊徑，在與里斯本外交部確認後，採取“放棄談判並維持澳門現狀直至時機成熟”的執政理念。<sup>47</sup>對比同治四年（1866年）1月19日郭嵩燾命人赴澳查明各項事宜的報告不難發現，“同治畫”所反映的城市風貌基本與報告中的文字描述相符。<sup>48</sup>

值得關注的是，經過亞馬留殖民擴張後的十餘年經營，澳門半島關閘以南一帶早已成為澳葡當局實際管轄的土地——這也是香山地方政府官員不敢向清廷承認而又不得不承認的情狀。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何繪圖者要呈現這個狀況？我們能夠從圖像中感知到其希望反映出澳葡殖民擴張的結果。蓮峰山炮台以及東望洋炮台上的燈塔，都深刻地反映出作者希望“呈現”的年代特徵，這也說明這幅地圖的繪製年

代應不早於1866年；而內港一帶海岸線及其碼頭的狀態，乃至圖像中所呈現的個別建築形態（如仍有雙塔頂的“大廟”以及擁有“華麗”正立面的“議事亭”），似乎在說明這個場景不晚於甲戌風災發生的1874年。

值得說明的是，該畫作的“真偽”並非本文旨在討論的問題——因為這幅畫本身就是“真實存在”的，但到底是不是一百多年之前所作，仍是筆者心中的一個疑惑。事實上，每個贗品或仿製品創作的背後都隱藏着其真實的一面，造假者／臨摹者在仿製他人的作品時，經常會因為無法抗拒誘惑而在作品中加進自己的痕跡，這些痕跡往往是平淡瑣碎的細節，從一個不經意的筆觸就會流露出造假者／臨摹者的真情實感，使得造假者無可避免地“出賣”自己。作為進行後續研究的學者（包括筆者在內），顯然我們需要深刻反思這幅地圖是否就是在清同治年間繪製，還是後人根據歷史事實而臨摹創作？因為當中涉及很多現在已鮮有人知的古地名，例如時人用以稱呼亞婆井的“人頭井”，又如始建於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的“墟亭”，尤其是“呂宋館”和“花旗館”，這兩處的位置及其豎立旗幟的位置都讓我們感受到作者對於這些地名的“篤定”。這些信息讓筆者感到既興奮又擔憂：興奮的是澳門城市史研究或許自此增添了一份重要史料，擔憂的無疑是該畫作的“真偽”問題。如果“同治畫”是真跡的話，將成為澳門城市史研究中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的圖像補充史料，這幅畫深刻反映出甲戌風災之前澳葡當局對澳門半島殖民擴張的影響，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極其重要的澳門畫作，有助澳門城市史、澳門社會經濟史研究者對十九世紀中葉澳門城市肌理及脈絡進行更為深入的判斷、互證、討論及分析。

當然，尚有一些圖像信息是筆者目前未能解讀的，如圖中繪有多個“白色塔狀”物體，其在“龍田村”至“龍環村”之間有兩座，沙梨頭一帶岸邊有一座，其含義是否為“路燈”？<sup>49</sup> 留待日後學者進一步考證。

鳴謝：感謝金國平教授、李軍教授、楊斌教授、林玉鳳副教授、朱天舒副教授、楊迅凌博士以及匿名審稿人對本人研究的指點與幫助，感謝畫作收藏者歐先生授權本人對該畫作進行研究。文責由筆者自負。

#### 註釋：

1. Heaven, Stuart. "Before the US-China Trade War: How America Wooed the Qing Dynasty with Ginseng and Fu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December 2018, www.scmp.com/lifestyle/travel-leisure/article/2178327/us-china-trade-war-how-america-wooded-qing-dynasty-ginseng.
2. 2023年6月16日展覽開幕式當天，呂澤強博士曾向筆者指出2018年12月該畫在香港展出時已獲得部分澳門歷史研究者關注，但似乎未見有專文論述。
3. 歐先生於2022年6月在美國拍賣行投得該畫作後，邀請筆者利用拍賣行提供的高清掃描圖進行研究。畫作直至2023年6月8日才運抵本澳，筆者和歐先生於6月9日在筆者辦公室拆開運輸包裝並由筆者拍攝高清圖像，隨後送往展館籌備展出。本文所使用的“同治畫”圖像，均為筆者於6月9日所攝，在此感謝收藏家歐先生授權筆者對該畫作進行學術研究及給予圖像授權。
4. 關於北山嶺拉塔石炮台的源流及考據，詳見盧嘉諾：〈天朝犄角：香山拉塔石炮台地名源流考〉，《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14期（2022），頁86-99。
5. “九”字為筆者識別，或為“天”字。
6. 華光廟一般供奉道教神明“華光大帝”。華光大帝俗稱“火神爺”，又稱五顯華光大帝、靈官馬元帥、華光尊皇等，不少粵劇戲班因戲棚容易引起火災而奉華光大帝為祖師爺，以求神明庇佑遠離火災。
7. 道光《香山縣志》卷四〈濠鏡澳全圖〉〈澳門東環圖〉〈澳門西環圖〉，清道光八年（1828年）刻本，頁111-114。
8. 譚世寶：〈澳門三大古禪院之歷史源流新探〉，《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3期（2002），頁1-26。
9. 碑文詳見〈署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兼管順德、香山二縣捕務水利稽查澳門總口稅務李，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府攝理香山縣正常加十級紀錄十次鍾，為出示勒石曉諭以垂永久事〉，此碑現存於蓮峰廟內。
10. 王文達、劉羨冰、伍華佳：《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47-250。
11. 即澳門土生土長的建築師湯瑪斯·阿基諾（José Agostinho

## 學術筆記

- Tomás de Aquino, 1804–1852)。
- Teixeira, Manuel. *Toponímia d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Vol. 1 of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pp. 217–218.
  - 該報紙又稱 *Hong Kong Gazette*，創辦人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漢文正使兼翻譯約翰·馬禮遜 (John Morrison)。
  - 該報紙是香港割讓給英國後第一份公開發行的英文報紙，屬半月刊，是一份官准的商業報紙，出版日期為 1841 年 5 月 1 日至 1859 年；其後該報成為政府刊物，並在報頭加上 Government 字樣。1842 年 3 月 17 日，*Hong Kong Gazette* 與 *The Friend of China* 合併。以上資料見於香港報業公會網站，203.80.1.113/html/m\_60cel/c60\_0602.htm，2023 年 6 月 15 日讀取。
  - The Friend of China & Hong Kong Gazette*, Bol. xvi, n. ° 84, 21 October 1857. 轉引自 Teixeira, Manuel. *Toponímia d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7. Vol. 1 of *Ruas Com Nomes Genéricos*, pp. 219–220.
  - 此處圖像所繪並未採用“大三吧”或“大三巴”，而其他形容“三巴”之音譯字均採用“三吧”。
  - 《一八七四年澳門市公共街道命名冊》，澳門：遺產學會，2017 年，頁 13。
  - Honor Rodrigues Viana, Euclides. *Cadastro das Vias Publicas de Macau*. Typographia Noronha & Co., 1906, p. 57.
  - Excelentíssimo Leal Senado da Câmara. *Cadastro das Vias e Outros Lugares Públicos da Cidade de Macau*. Tipografia PO MAN LAU, 1925, p. 96.
  - 人頭井為“亞婆井”的別稱。
  - 1865 至 1866 年澳門地圖將此處標為“Alfandega”，即“海關”之意，並在周邊繪有兩個“Doka”，即碼頭；道光《香山縣志》的〈濠鏡澳全圖〉則將此處標記為“澳夷抽分館”。
  - 關於香山佐堂的研究，詳見金國平：〈佐堂入出澳考〉，《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 年，頁 319。
  - 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遜 (John Thomson, 1837–1921) 曾於 1873 至 1874 年間在倫敦出版《中國與中國人影像》攝影集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當中收錄的照片為 1868 至 1872 年間在中國所拍攝。圖 20 在英國威康收藏館 (Wellcome Collection) 網站上被標註為 1870 年之作；而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網站上的一個版本，則被標註為約 1869 年。詳見威康收藏館網站，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jbrm9axt，2023 年 7 月 11 日讀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網站，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289342，2023 年 7 月 11 日讀取。
  - 其中 1828 年道光《香山縣志》中的〈濠鏡澳全圖〉繪有“桔仔圍尾”“植槐里水口”“第頭巷水口”“吉慶里水口”“十八間尾水口”“舊茂記水口”等以圍、里名稱指示地名的大小碼頭，並出現“下環街”這唯一一個以街道標註的地名，其主要以重要建築物或村落進行標識，然而該圖並非彩色畫作。詳見道光《香山縣志》卷四〈濠鏡澳全圖〉，清道光八年 (1828 年) 刻本，頁 111–112。
  - 1828 年道光《香山縣志》中的〈濠鏡澳全圖〉繪有“望廈村”“龍環村”及“龍田村”，詳見道光《香山縣志》卷四〈濠鏡澳全圖〉，清道光八年 (1828 年) 刻本，頁 111–112。
  - Ljungstedt, Andrew.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早期澳門史). James Munroe & Co., 1836.
  - (葡) 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著，金國平譯：《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澳門：澳門基金會、葡中關係中心，1997 年，頁 1。
  - [清]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使粵奏稿》卷六〈會奏巡閱澳門情形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145。
  - 這個數字有可能沒有將華人女性納入統計範圍內，詳見蘇一揚 (Ivo Carneiro de Sousa)：〈前工業化澳門的居民及人口體系 (16—19 世紀)〉，文章收錄於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編：《澳門史新編》第三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 年，頁 1024；人口資料來自 Castro Sampaio, Manuel de. *Os Chins de Macau* (澳門的華人). Typographia de Noronha e Filhos, 1867.
  -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5 de Março de 1867, pp. 61–64.
  - 十九世紀下半葉，澳葡當局分別在 1867 年、1871 年、1878 和 1896 年進行了四次人口普查。其中 1867 和 1871 年的普查範圍為澳門半島；1878 年普查範圍為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並在普查報告列明大、小橫琴島歸氹仔政務廳管轄 (O concelho da Taipa)；1896 年在上述基礎上新增大、小橫琴島多村。關於十九世紀下半葉澳門人口普查研究，詳見盧嘉諾：〈近代澳門人口普查研究〉，博士論文，澳門科技大學，2023 年 6 月。
  - 關於澳門望廈村的鄉村結構解體，學界已有專文研究，詳見林廣志、張中鵬：〈一個傳統中國鄉村的飄搖與解體——明清時期澳門望廈村地域與空間之變遷〉，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全球視野下的澳門學：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

- 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頁527-538。
32. 〈知縣楊文駿查覆澳門新舊租界情形節略〉，《香山縣志續編》卷六〈海防〉，民國二十年（1932年）刻本，頁7-10。
33.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6 de Maio de 1867, vol. XIII, no. 18, p. 98.
34. 關於1867年至1868年澳葡進行的首次澳門華人人口普查研究，詳見盧嘉諾：〈殖民管治的人口策略——1867年澳門華人人口普查的背景、技術及其影響〉，2022年第四屆中國經濟史青年學術研討會，《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2022年8月19日。
35. "Repertição de Estatística de Macau."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3 de Setembro de 1867, vol. XIII, no. 39, p. 221.
36. 關於十九世紀下半葉澳門人口普查研究，詳見盧嘉諾：〈近代澳門人口普查研究〉，博士論文，澳門科技大學，2023年6月。
37. 關於該圖，湯開建教授有專文研究，詳見湯開建：〈嘉慶十三年《澳門形勢圖》研究〉，《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0、41期合刊（2000），頁93-98。
38. 該圖現收藏於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館藏編號為Or. 12242 (7)。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林天人在“數位方輿 Reading Digital Atlas”網站中表示，對照該圖的“漿船”編號，認為該圖繪於清嘉慶十六年後，而圖中的英文註記則表示該圖為1841年2月26日英軍攻佔虎門炮台不久在關（天培）將軍（水師提督）臥室尋到。詳見〈前山寨與澳門形勢圖〉（識別碼A104000126），載“數位方輿 Reading Digital Atlas”網站，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126，2023年7月12日讀取。
39.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549-1550。
40.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649。
41. 1847年5月亞馬留通知耆英要在氹仔修建碉堡，以遏制海島活動，耆英派員勘察發現已建成供一座多名士兵使用的碉堡。詳見1847年8月23日致海事暨海外部公函，第5號文件，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澳門，1847年函盒，轉引自（葡）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澳門：澳門基金會、葡中關係中心，1997年，頁99。
42. Williams, Samuel Wells. *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Consisting of a Collection of Details and Regulations Respecting Foreign Trade With China, Sailing Directions, Tables, Fourth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6, p. 15.
43. 《澳門專檔（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130條，1995年，頁121-124。
44. 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
45. "No. 39 Parte Oficial." *O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25 de Setembro de 1865, p. 156.
46. 關於澳葡設立華政衙門的研究，詳見張廷茂：《晚清澳門華政衙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47. Saldanha,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and Jorge Santos Alves. "Aproximar Portugal e a China num Entendimento Amistoso." *Estudos da História do Relacionamento Luso-Chinês*.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 1996, pp. 281-392.
48. 〈廣東巡撫郭高燾為委員赴澳查明各項事宜並由驛附呈事致總理衙門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753-757。
49. “路燈”這一猜測為2023年6月28日筆者與李軍教授、楊斌教授和朱天舒副教授在展覽現場的討論猜想。

